

民国时期的基督教师范教育

——基于以四川为中心的考察

凌兴珍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四川成都610064)

摘要:来自教会内部与外部的师资需求压力是导致清末民初在华基督教师范教育产生与发展的直接原因,培养信教的中国教师以实现教会教育“更彻底的中国化,更有效的教育化,更切实的基督化”乃至在中国长久存在下去的目标则是基督教师范教育发展的根本动力;重视教育理论与教学方法,强调教学实践、教育研究与学用结合,重视中学、西学与宗教教育,是基督教师范教育的共同特点。

关键词:民国时期;基督教;师范教育;四川;华西教育会

中图分类号:G659.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315(2005)06-0122-10

教会教育与近代中国历史相始终,而教会学校的师资培养不仅是教会教育发展的基础,而且“教会学校与中国近代师资培养工作的关系是不可否认的”,“它们成为我国各级学校教师的重要来源”,然而,学术界虽对教会在华教育活动作了较多研究,但是对教会学校的师资来源尤其是教会在华师范教育问题却较少关注,已有的研究论著仅涉及晚清教会学校和民国教会大学教育院系参与师资培养的问题,而对民国时期教会学校参与师资教育的情况基本未予专门讨论^①。最近,笔者发现在20世纪二十年代尤其是20年代,正在中国非基督教运动暨收回教育权运动轰轰烈烈开展的背景下,西部基督教教育会对四川基督教师范教育进行了积极规划与推进以至其体系基本形成,然而涉及四川教会教育研究的论著却基本未予讨论^②。鉴此,本文拟通过对民国四川基督教师范教育的萌发背景、兴衰历程及其办学特色的考察,以揭示民国基督教师范教育发展的部分情况,弥补教会教育史与师范教育史研究的不足。

一 基督教教育事业的发展及其师范教育的萌发

鸦片战争前后,西方传教士已进入中国境内,因传教工作进展缓慢,他们相继在中国南部沿海地区办起了学校。鸦片战争后,凭借不平等条约与武力庇护,在华教会学校逐渐增多。在创办初期,教会学校大多以小学为主,除增设圣经

课,有时外国传教师略授算术、地理二科外,基本沿用中国蒙学、私塾的教学内容与教授方法,并聘请中国儒生担任“经学”与“中学”教师。

到20世纪初,随“壬寅学制”、“癸卯学制”相继颁布和科举制废除,晚清新式教育及其师范教育快速发展,研究西学之风盛行和“小学教科扩张范围”,原被视为异己的新学内容受到鼓励,以外语和数理化见长的教会学校成为上等家庭子弟报考的热门和新式学堂西学与外语师资的供给场所,加上1906年学部“外人在内地设学无庸立案,学生概不给奖”[1](第三编,57—58页)法令,自成体系与自由发展的教会学校由小学发展到中学、大学。同时,教会学校师资不足问题日渐严重,向各外国差会母国请求派遣信教师资和聘请教外的中国儒生担任教员成为缓解师资供求矛盾的暂时之举。然而,各差会之母国派遣到中国担任教职的人数不仅有限而且大多未受过师范教育或汉语训练,难以满足教会学校日益增长的师资需求和发展需要;而聘请教外的中国儒生任教师之举则非常危险,因为那些熟读中国经典的儒生经常会不自觉地孔子及其儒家伦理道德置于基督及其教义之上,“甚且有反对基督教者,故其任职学校,每于宗教感化力,大有损害”[2](62页),违背教会教育的目的与精神——“使每个人委身于耶稣基督,俾上帝之国祚复建于人世,并创造

收稿日期:2005-09-28

作者简介:凌兴珍(1965—),女,重庆渝北人,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专门史博士生,《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编辑部编审。

一适合于基督教教义之社会制度”[3](卷5,315页)。因此,来自教会内部的反对之声和要求教会学校自己培养师资的呼声逐渐强烈。

1868年,传教士皮特首先发表文章指责教会学校聘用教外教师“玷辱了上帝”;1877年,圣公会传教士汤葛理(F. H. Thompson)在传教士第一次全国大会上指出:“信仰基督教的男女最适合担任教师……教师本人不仅仅是教会学校的教师,更应是个十足的基督教徒”;1890年,在传教士第二次大会上,萧牧师(Rev. C. Shew)指出“聘请异教徒教师到教会学校工作,是一个错误”,潘慎文(A. P. Parker)建议“每一所教会学校里作出努力,保证受过良好教育的中国教徒,使他们兼有基督教教义及西学知识”;1893年,在“中华教育会”第一届年会上,德国传教士花之安(Faber Ernst)更敦促教会注意训练中国教师,认为“未来教会教育工作的成效,很大程度上依靠中国教师的努力”[4](48页)。1902年,中华教育会第四届年会开始筹划设立自己独立的教会师范学校与管理机构;1905年,第五届年会设立了专门的“师范教育委员会”,并提议在中国华南、华中、华北、华西设立四个联合会分会,负责筹划与指导师资训练班和师范学校。1907年,传教士入华一百周年大会决议敦促教会本部在战略要地合作创办一些女子大学及师范学校。1914年,教会全国大会决议拟请布道部,使担承教育事业之西教士“于例假返国内,得有机缘,研究教育方法及师范专科”,同时“注意于栽培中国教习”[5](10—11页)。1922年,美、英、中三国教育家、神学家、传教士组成的中国教育调查团调查报告书认为“今后教会学校必须把基础完全放在质量上”,建议在中国设立各类师范学校,在中学校中附设师范科,在每一教育中心地点设立“强健之女子师范学校”[3](卷3,85、88、98页),目的是实现教会教育“更彻底的中国化,更有效的教育化,更切实的基督化”[5](150—153、180—183页)目标,并对官立学校产生影响。

在上述背景下,20世纪最初20年,基督教师范教育陆续创办并发展起来。到20年代中期,基督教师范教育发展到了顶点。据调查,到1922年,全国有基督教师范学校48所,师范生总数622人[6],“对于造就小学教员的师范学校,已很发达,所以教会学校不必再在这师范训练一方面上努力”[5](471页)。20世纪初期,陆续设立的教会大学一般都设有教育系或教育学院,培养教会中学教师。据统计,到1927年,中国基督教专门以上学校26校,其中设教育系者13校、幼稚师范1校、体育系2校[5](139—140页);1934年,教会大学18所,其中设教育学院者有武昌华中、辅仁、沪江3所,设教育学系或教育心理学系者有东吴、武昌中华、金陵、沪江、岭南、齐鲁、燕京、华西协合、福建协合、圣约翰10所[7](丙编教育概况,87—140页)。

由于教育被看作是民族主义的重要工具,面对“基督教教会欲极力在华扩充师范教育事业”之举动,教育界对其危害

的认识逐渐加深,要求政府收回教会师范教育权的呼声逐渐强烈。1925年,国家主义教育思潮的代表人物杨效春痛责“教会在吾国办理师范学校,操纵吾国国民教育之命脉”,“不仅蹂躏我现代的国民,并蹂躏我第二代的国民”,建议政府“一方面出面与各国政府据理力争,收回自办,一方面通告国内教会师范学校,限五年内一律停办,或移归我国地方教育当局委人接收办理”[8](4页)。1933年,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程天放指出,“师范教育之良否,民族前途之命运系焉,以如此重大之事,自不能委权于私人,而应由政府办理”[9](393—394页),建议取消私立学校办师范教育的权利。

30年代前后,国民政府颁布并多次修订私立学校规程,限制私立学校设立或发展师范教育,并规定教会学校不得以传布宗教为目的,不得以宗教为必修科目[10](总第150、154页)。1938年,国民党临时全国大会通过《战时各级教育实施方案纲要》,限定只有国立大学可以办师范学院并给师范生免费待遇,“私立大学院校之教育学院及学系,成绩优良者,确定其教学范围,指定专为造就职业及社教师资,或予以保留外,其余均停止招收新生,逐年结束,以统一全国中等学校师资训练”[11](54页)。

因受师范学校不得私立之影响,私立师范学校(含教会私立)校数与学生数逐渐减少,由1931年的36所,学生6586人,1934年的32校,学生6761人,减少到1939年的14所,学生1709人,1945年的10所,学生1736人[10](总第150—152页)。各教会大学积极增聘师资,调整课程,努力达到教育部的课程标准,以保留教育院系及办师范教育的权利。据统计,到1946年,私立教会大学有13所保留教育院系,其中北平辅仁、大厦、武昌华中3所保留教育学院,金陵、燕京、岭南、沪江、圣约翰、武昌中华、华西协合、震旦、齐鲁、福建协合等10所保留教育学系[10](总第650—672页)。共和国成立后,教会大学由人民政府接收,基督教师范教育的历史正式结束。教会师范教育的衰败,如同教会教育一样,“主要的不是一种教育制度或宗教信仰的失败,而是一种政治的失败”[12](463页)。

二 华西教育会与四川基督教师范教育的萌发

1640年,法国耶稣会士利类思司铎入川“传扬福音”[13](1页)。到鸦片战争前,四川教民5万人左右,位居全国第一。鸦片战争后,法国传教士在四川的传教活动更趋活跃,英美基督教或称福音教开始进入四川。各差会将创办教育、医疗、慈善、出版等事业作为布道传教的重要方式,四川英美会的开山人赫斐狄曾说:“我们传教士很懂得,如要使中国人信道,就必须加强教育工作”;四川基督教教育的代表人物方叔轩将教育视为“选择未来的中国教会领袖的场地”[14](341页)。1899年,各差会小学31所,学生806人;1907年,增至173所,学生达3316人;1919、1921年,基督教中小学482所,学生18000余人,仅次于福建、山东、广东三省[14](217—218、341页)[15](384—387页)。

为了解决教会学生升学与师资缺乏问题,1905年11月,按照中华教育会第五届年会在华西设立分会的决议,华西差会顾问部于成都开会,成立了“小学和中学联合委员会”与“华西协合大学临时管理部”,以筹办教会师范学校和教会大学。1906年,“小学和中学联合委员会”改组为“华西基督教教育协会”(简称“华西教育会”),而“协合大学临时管理部”则改组为“华西协合大学理事部”。20世纪最初20年,为了“在最短时期内能见到会内各校之教师均为受过师范训练者,并有学识优美、经验宏富之视导员多人”[16](39—41页),华西教育会教育部加强了对教会学校师资预备、训练事宜的领导与策划。1906年,华西教育会在成立年会中,“即议及基督教徒教员之供给问题”,“预备设男女师范各一”。经过筹划,1910年3月,华西协合大学成立;同年夏,潼川、南充暑期师范学校开校,联合会设于成都的华西协合男师范学校正式开班;1914年,华西协合女师范学校设立,华西协合大学于文正科中附设教育科。1914年,教育联合会年会决定举行师范教育运动,以三年为期,后因种种原因,延至1917年始举行。1917年,教育联合会设中文副书记,专管师范教育文牍;1918年,设师范教育部书记。到1918年,华西教育会已设有华西协合大学教育科和中等师范科、华西协合男子与女子师范学校、暑期师范学校、师范讲习会等多种师范教育机关,实际受教人数达331人[2](62—63、71页),四川基督教师范教育体系基本形成。

然而,受过教会师范训练和信道的师资毕竟有限。据华西教育会年会报告:1917年,四川注册教会学校289所,教员744人,未注册各校教员约二三百人,合计教会学校的中国教员已达1000人左右,“曾经肄业于官立速成师范者,盖不在少数,然此等人往往不能满意。是以教育联合会之意,颇愿教会学校各教员,均受教会所设机关之教育”[2](62页)。据统计,四川全省8所中学以上基督教学校的信道教员,1921年为50名[17](333页);1924年为47名,“该省基督教势力之不完满原因,以中西职员缺乏为最大”[18](58—59、222页)。另据1924年方叔轩报告:“据华西教育会总干事的调查,登录的小学校教员,共有443人,内中有334人,完全未受过师范训练。某视学对我说,他区域内乡间学校,差不多没有一个教员,是受过师范训练的。”[19](18页)

20年代前后,华西教育联合会进一步加强对师范教育的规划。1919年,华西教育会书记长华雷士指出:“欲求基督教教育与教会全体之日有进步,则尤非中国教育家日有进步,且知其对于教会子弟所负责任不可”,因此建议:添聘曾受完美教育的外国教员,每一教会至少聘一个学识优长的外国人任教育监察员;对少数才力过人、具有教育领袖才能者给予优待金,以二年为期使其入外国教育研究科以资深造;教会以中国人充当教育管理员及视学员,其资格限定男子应毕业于华西大学教育科,女子应毕业于中等师范,由教会予以金钱上的补助;各教会延聘教员至少应以曾受一部分教育

之人充任教职,凡未受师范教育者于被聘时,非申明自愿肄业于暑期学校及受教员试验者概不延聘;各教会应认教员为专职,其地位、薪水、权利均应与牧师相等;为宣教师及主日学校教员设宗教教育的特别科以及为为父母者设教养子女的短期讲习科等[2](72—74页)。上述建议在20年代华西教育会年会中逐渐形成决议案,由各差会具体落实。

1924年1月,华西教育会教育部在华西大学召开第17次年会,会议第9、25、26、28、31项决议案均与教会师资培养与训练有关。第9项举田海源、饶和美等五人为商议增进师范教育的委办;第25项为接收促进师范教育发展委办的建议报告四点:一、由师范学校将该校情形通报各会,请各会派人至师范学校肄业,二、请教育会于1924年4月15日以前召集各会视学或教育督办会议,注意养成及训练教员的问题,三、请教育会及教育科筹备与组合夏令师范学校,四、请教育会干事多至各地开教员研究会;第26项建议大学设法扩张暑期师范学校,建议距离成都四五日路程的各教会送学生到成都暑期师范学校,其他如重庆、保宁、荣县等地可由一教会独办或数教会合办暑期师范学校;第28项请执行部注重查学及办理辅助教师进步的学校与会社;第31项请各处办教育者每年至少须举行教育礼拜一次[20](39—44页)。秋季,华西教育会总干事饶和美与华西协和男子师范学校校长暨夏令师范学校校长方叔轩视察川北学务,并在潼川、绵竹、绵州(即绵阳)、彭县等处召开教育会议,征求教育人员意见,形成高级中学设文科教育科、夏令师范课程增为六周、华西教育会开办函授课程三条教会师资培训意见[21](25页)。饶和美在致教育董事部的报告中指出:华西教育事业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预备学校师资和加添师范等职业科目于会内各中级学校[16](39—41页)。1924年11月14—15日,在重庆打铁街的华英女校召开了华西教育会教育部第18次年会,议决案第2、3、4、5、9、20项与师资培养有关。第2项建议重庆各中学校在高中第一或第二年设师范课程;第3项建议各教会用下列方法预备学校教师:“甲.凡为小学教师者,必须在初中毕业后至少读过高中一年,其在此一年内所修课程之大部分须为教育方面者,乙.凡为初中教师及小学视导员者,须由大学教育预科毕业,丙.凡为高中教师及比小学范围较大之视导员者,须由大学教育正科毕业”;第4项议决教育会为各教科预备60—150习题,供各教师应用;第5项建议各教会斟酌教会学校聘请受过师范训练的人为教师之时期是否已到;第9项为现任教职者开办教育函授课;第20项议决将女子师范课程与教育会所定中学职业科联络的事交女师范执行委办办理[22](34—37页)。1925年12月1—2日,在华西大学校内召开了华西教育会教育董事部第19次年会,第3、10、11、14项议决案与师资培养有关。第3项议决案重申了第18次年会第2项议决案的内容;第10项建议重庆各中学校采用初中内设师范课程、高中内合设师范分科及开办夏令师范学校三种办法训练教会学校师

资;第11项建议各教会在此后三年内使初小教师均受师范训练;第14项建议催促各教会送教师入夏令师范学校[23](16—19页)。

在华西教育会的规划与领导下,到20年代中期,四川基督教师范教育发展到顶点。此后,因政府限制,四川基督教育初等中等师范教育先后停办,共和国成立后,华西协合大学收归人民政府,四川基督教高等师范教育完全结束。

三 四川基督教师范教育的兴衰

四川基督教师范教育体系,由本科、中等、初等师范以及速成与短训形式的师资训练活动组成。

(一) 华西协合大学教育科与中等师范科

1910年3月,成都华西协合大学创立,各科修业期限六年,前三年为普通科,亦称预科;后三年为专门科或学位科,亦称正科。1911年,辛亥革命发生,学校暂时关闭。1913年,复课。1914年,华西协合大学在文正科中设教育科,“盖为养成视学员、教育行政员、师范教员、中学校长而设”[2](64页)。1915年,联合会之男师范学校划归华西大学管理。1917年9月,中等师范科设立,修业期限二年,主要收取中学毕业生,培养高小教员。1918年春,师范各班组成教育专科。1924年秋季,实行男女合校,正科招收女生8名,读教育科者5人[24](36—37页)。1927年2月,理事部会议推举方叔轩、华显达、朔培元、刘之介、贝爱理五人为师范管理团职员,方叔轩任教育科主任;停办夏令师范及夏令大学,师范学校课程能与中学合办者斟酌合办[25](52—54页)。1931年,向国民政府教育部申请立案。1932年,教育部命令附属华西协合高中文、理、师范及农科改为普通科。1933年,高中师范科停办,改为普通中学;华西协合大学在教育部立案,张凌高任校长,学校设文学院、理学院和医牙学院,教育系为文学院下的一个系。1949年成都解放后,由人民政府收回自办。该校历年毕业的教育科学学生较少,至1917年上期,共毕业教育科学士5人,1918年上期毕业4人[2](64页),1924年毕业教育学士1人、师范生19人;1924年秋季,在校的六个年级教育科学学生44人[24](36—37页)。到1949年,华大毕业学生35届2197名,一半以上从事医疗卫生和教育事业,在国内外享有盛名[14](346页)。

(二) 初等师范学校

华西设有基督教初等师范2所,一为华西协合男子师范学校,一为华西协合女子师范学校,均设于成都,由教育联合会筹定基础。20年代初,二校均改为中等师范学校。二校成立后,虽不受联合会管理,每年仍呈送报告,且在联合会教育部设有直接代表。最初二校学生皆由教会高等小学升入,以养成初等小学教员,修业二年,比官立学校少二年,原因是教员“方极缺乏”[2](65页)。

华西协合男子师范学校又称华西协合师范学校。1910年秋季,由联合会于华西协合大学校内设立,校舍为万德门纪念室(“明德大学院内”),寄宿舍是各差会房舍。1911年,

辛亥革命发生,学校停办。1914年,薛尔谷返成都后,始开设正科。1915年8月,实习学校一弟维初等小学开办;12月,头班生3人毕业。1915年,划归华西协合大学管理。大约在1919年前后,有扩张课程计划,“将入学资格增高,以修完中学二年级课程者为限”[2](67页)。1921年,正式改组为中学教育(或师范)分科学校。1922年,呈请省署立案,毕业生发给师范毕业证书,并给予华西协合中学教育分科毕业证书,由省署钤印[26](87页),学生毕业后准予升学。1924年,开始招收AB班学生,A班收中学修业三年期满生,一年毕业;B班收中学修业二年期满生,二年毕业,“一面研究教育上之原理,一面从事中学课程之补修,似此所习各科既不亚于中学,对于社会上之应用或差强一等”[27](41页)。1928年,奉令停办,实习学校一成都私立弟维小学并入正坤女校(华西大学教育科与美以美会女布道会所办)。

华西协合女师范学校又称私立成都协合女子师范学校。1914年8月21日,由北方美以美会之外国妇女传道会、加拿大美以美会之妇女传道会、美国浸礼会之外国传道会、朋友会之外国传道会四教会联合设立,校址成都干槐树街1号,国外董事会掌握管理权,成都设一执行委员会,傅瑞芝任校长。1915年1月,招收高小毕业和初中或同等学力者,进行一年或两年的小学师资训练。1915年,实习学校一树基小学开办。该校受教与毕业生不多,1916年,头班生毕业;1918年7月,毕业学生8人[2](63、71页)。1922年,增设幼稚师范科及其实习场所一树基幼儿园。至1930年,还未在教育部备案,设二年制师范,实支经费1800元,在校女学生18人[28](84页)。1932年10月,未立案,有师范和幼稚师范各一科,经费4412元,校董事长明德馨,职员3人,教员9人,在校学生48人,毕业学生331人,年级2个,职员年薪600—1600元,教员年薪50—250元[29](8页)。1934年,成都市教育局批准树基小学立案。1935年,四川省教育厅批准幼稚师范科立案。1936年,设二年制幼师科[30](43页)。1939年,添设幼儿园,在校生25名,毕业生30名,年级5个,设二年制幼稚师范,经费4000元,校长潘澹如,三台人,1936年8月到职,任职2年[31](28页)。1939年5月,疏散至仁寿胜景桥(今文林镇铜锣街南侧)。1940年,科别简师,班级2,学生22名[32]。1941年,迁返成都。1942年秋,停办。

(三) 短训形式的师范教育机关与活动

短训形式的师范教育包括暑期师范学校、暑期讲习会、师范讲习会及其他师资培训与教育活动。

暑期师范学校又名夏令师范学校。1910年夏,南川、潼川两处暑期师范学校成立。1914年7月,成都开设第一暑期师范学校,除1916年因政治影响而未开课外,年年开办,直到1927年停办。第一暑期师范学校开办,由教育联合会直接管理,1915年移交华西协合大学评议会管理。第二暑期师范学校,1915、1916年在荣县开课。第三暑期师范学校,1918年在重庆开办。此后,暑期师范,各地续有开办者。

其中,最有影响、成绩最佳的暑期师范学校是第一暑期师范学校,至1919年已毕业四期,共得学生80人。

华西协合大学于1918年开设暑期讲习会,别任一副校长主持,由大学教育科修业生担任,经费全由学费支给,各讲师多不取薪金。1919年,开设三班,两班为初等小学教员正则科,一班为圣经教授之特别科;8月,杜威式实习学校开办,供学生观察与实习。1924年,夏令大学添设宗教教育讲习社和体育讲习科,前者学生45人,其中女生35人,养成主日学校教员[24](36—38页);后者函请相距成都五日路程内的学校派一名教员来成都讲习,来学者约20人,由大学医科教员担任解剖、生理、卫生及救急法课程,成都高师及通俗教育馆体育主任陆佩萱担任体育原理及操场实习课程,每日授课四小时,为期六周,养成初中及高小体育教员,“宗教教育讲习科及体育讲习科,均有优美成绩”[16](41页)。

师范讲习会于1914年11月首先在遂宁开办。至1918

年,共开讲习会9次,均由联合会主持,会期通常一星期,每次会员,合男女并计,平均50人。“凡一县的中外教员,届时皆聚集城中,共同研究。……会中讲演,以教育问题为主,又有种种表演及实习教授。……其于改良教授及引人注目师范教育之成绩,皆足以使吾人闻之而心慰矣”[2](69页)。教育联合会预定计划,1919年前四川重要都会各开讲习会一次,1919年后请各地方自办,联合会加以助力而已。

此外,其他教育机关也积极参与师资培训活动,外国教员的语言和师范训练也在同时进行。

四 四川基督教师范教育的课程设置与办学特色

为了说明西部基督教师范教育的办学特色,我们不妨分别将1919年各校的课程设置情况列为表1,1924、1925年暑期师范学校课程列为表2,1925年华西协合男子师范学校课程设置列为表3,以备后文讨论。

表1. 1919年华西各基督教师范教育机关每周授课时数一览表

华西协合大学	教育科	第一年	教育心理学		主日学校法		教育行政(甲)		教育概论		教育文集		社会学概论		参观学校		批评班		合计		
			2	2	1	1	2	1.5	0.5	2	12										
		第二年	实习教授		教育社会学		学校行政(乙)		社会学问题		中国教育史		教育文集		教授法		学校卫生		合计		
			2	1	2	1.5	1	1.5	2	2	2	13									
		第三年	教育监督法		教育文集		实习教授		西洋教育史		教育哲学		比较教育学		研究会		教授法		合计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2						
中等师范科	第一年	* 圣经	* 英文	* 汉文	音乐	教育概论	教育社会学	养蚕及手工	观察及批评	体育及游戏	学校卫生	主日学校法	合计								
		2	5	3	2	1	2	2	2	2	1	2	24								
	第二年	* 圣经	音乐	教授法	* 汉文	* 理科	学校行政及学校法	主日学校法	* 近世史	养蚕及手工	教育史	实习教授	合计								
		2	2	2	3	3	2	2	3	2	1	2	24								
华西协合男子师范学校	第一年	教育概论	心理学	普通教授法	圣经	批评法	主日学校法	音乐	手工	地理	特别教授法	西洋教育史	中国史	体操	黑板报	理科	汉文	数学	园艺	养蚕学	合计
		0.5	1	0.5	2	2	2	2	2	2	1	1	3	1	1	2	5	2	2	2	2
第二年	中国史	理科	园艺	圣经	音乐	学校卫生	体操	手工	学校管理法	实习教授	地理	汉文	黑板报	数学	养蚕学	中国教育史	合计				
	3	2	2	2	2	1	1	2	1	2	2	5	1	2	2	1	31				

华西协合女子师范学校	第一年	学校管理法	宗教教育	汉文	算术温习	地理	图画	初等小学文科教授法及批评辩论	实习教授	心理学	手工	裁缝	合计
		2	2.5	5	4	2	0.75	7	7	5	1.5	0.75	30.25
	第二年	教育史	算术温习	汉文	学校管理法	地理	宗教教育	实习教授	初等小学文科教授法及批评辩论	合计			
		2	4	5	2	2	2.5	8	7	32.5			

资料来源:根据华雷士《中国西部之师范教育》,紧弧译,《教育杂志》1919年11卷第8期,第64—68页改制。

说明:华西协合大学中等师范科加*的各科与大学预科同班上课,华西协合男子师范学校原表第二年合计课时为32,此表按实际课时之和和改为31。

表 2. 1924、1925 年夏令师范学校课程设置一览表

甲 部 课 程				乙 部 课 程			
教育大纲	学校与社会	学校卫生	国文教法	教育大纲	儿童心理	学校与社会	国文教法
普通教法	体操与游戏	实业科	数学教法	普通教法	公民科	体操与游戏	数学教法
学校管理法	圣经教法	图画与手工	历史教法	学校管理法	图画与手工	圣经教法	地理教法
参观第维学校教法 (第维学校设赫斐院内,以供本校学生参观及实习之用)							
除课程外,特备有演说、旅行、游戏及其他消遣事项							
备注:华西协合大学夏令师范课程分为甲乙二部,每年依次教授一部,凡读满甲乙两部课程者,试验及格,学校给予教员证书,效力三年。							

资料来源:根据《成都华西协合大学夏令学校招生广告·四课程》,《华西教育季刊》1924年第2期第1号附页及1925年第3卷第1号第46页制成。

表 3. 1925 年华西协合师范学校每周授课时数一览表

AB 班第一年课程及教科书						B 班第二年课程及教科书					
课程	每周学时	课程	每周学时	课程	每周学时	课程	每周学时	课程	每周学时		
实习	5	*教育社会学	2	英文	6	国文	文字学	2	代数	3	
教育原理 (共 10 周)	5	*教育测验	2	*法制	2		古文选	2	几何	3	
							国语文选	2			
教育心理学	2	*管理法	2	*近代社会问题	2	历史	2	化学	4		
修身	2	国文	文字学	1	物理	4	艺术科	2	英文	6	
各科教学法	6		左传	2	*手工	2	儿童学	2	实习	2	
*农业	2		古文选	1	音乐	2	体育科	2	修身	2	
*图画	2		国语文选	2	体育科	舞蹈游戏		教育史	2		
*学校卫生	2		实用文件	1		童子军					
备注:每教时 40 分钟,开学 10 周后起开始实习,凡课程上加星号“*”者系指一学期,其余均为一学年;实习系开学十周后起始。											

资料来源:根据《成都华西协合师范学校通告·十课程及教科书》,《华西教育季刊》1925年第3卷第2号,第89—91页的表格改制。

(一)重视教育理论与教学方法学习,中学与西学并重

1919年,华西协合大学教育科分为二部,每部均三年毕业,第一部为普通部,“盖为文艺、科学、宗教三科学生之预备为教员者而设,使于本科以外,兼习教育者”;第二部为特别部,“凡学生之预备为教育行政员者,则并习第一第二两部”[2](64页)。1919年华大教育科的课程设置主要侧重于教育知识、管理知识与教学技能的训练;而1919年华大中等师范科课程有超过1/3的课程与教育科同班上课,教育学、学校管理课程约占一半,另设有养蚕与手工一门,汉文、英文、理科、历史等基础科目的课时较多(参见表1),说明华西协合大学的师资培养目标很明确,就是学生必须教育专业知识扎实,教育技能训练全面,且具有一定的汉文与英文知识。华西协合男子与女子师范学校最初是按初中师范课程设置,从1919年开设的课程来看,教育知识、教授技能及学校管理课程比例很大,养蚕、园艺、缝纫等实用技能训练课程被开设(参见表1),汉文课时较多,而英语课却并未开设,说明二校更看重教育知识与技能以及实用技能训练,并不看重对小学教师职业影响不大的英语。1919年,暑期夏令师范的课程分为二部:“(一)教材及教授法,如圣经、汉文、算术、地理、历史、卫生、(图画)、(手工)、(体育)、(音乐)等是;(二)教育研究,如教育概论、教授法、学校管理法等是”(加括弧的只授课不试验),对于各科教授法极为注重,此等半资格之教员除其所任主科外,至少有高等小学程度。1924、1925年,华西协合大学夏令师范学校课程分为甲乙部,各11门[33](附录,46页),每年依次教授一部,各科教学法占绝大比例(参见表2),说明暑期师范侧重教学技能培训,而对小学教师职业帮助不大的英语课程则不开设。可见,20年代以前,华西基督师范教育机关均注重教育知识与技能训练,注重实用技能培训和汉文教学,而对从事小学教师职业帮助不大的英语课却并不看重。

20年代以后,随新学制颁行,西部基督教中等高等师范教育机构纷纷调整课程设置,增聘中外教师,努力与教育部规定的教育课程吻合,中国文化知识与传统教育及英语课程比重增加。根据1924年华大教育科长饶和美报告:凡欲在教育科课程之正科毕业者,须修业60学分课程,即国文6学分、英文9学分、文科内选修6学分、宗教4学分、教育21学分、各科内选修14学分;凡欲在预科毕业者,须修业63学分,即国文9学分、文科内选修7学分、理科内选修10学分、宗教6学分、教育14学分、各科选习17学分;该年,华大教育科第一学期课程有教育大纲、宗教教育、高级小学初级中学各科教学法(大学各科教员分任,每周授课六小时)、中等学校农业、中等教育问题、中国教育制度法令、体育7门,第二学期课程有学校行政、儿童心理、高级小学及初级中学各科教学法(大学各科教员分任,每周六小时)、中等学校农业、中等教育问题、近代教育史、教育哲学、学校视导法、体育9门[34](40—41页)。又如1921年前后,华西协合男子与女

子师范学校正式改组为中学教育(或师范)分科学校,课程按中等教育分科程度设置,新添教育测验、文字学、童子军等科[35](2页),力争与新学制的中等师范课程吻合。1922年,男子师范学校的课程呈请省署立案获准。1925年,华西协合师范学校聘有男女教员18人,能够开出30门课程[36](81—82页),AB班第一年设置课程18门,每期每周平均课程45.5学时(未计体育课);B班第二年课程12门,每期平均每周36课时,改组后的课程加强了学生的中国文化传统与知识教育,并增设了英语课程且每周高达6学时,使教育知识与技能训练,中学、西学以及英语学习并重,而宗教知识的传授则融入修身等课程中而不再单独设置(参见表3)[37](89—91页),学生的学习任务更加繁重,训练更加严格,要求亦更高。据华西协合男子师范肄业的学生蒋富祥说:1924年,华师“教育的课程,占大半数,中学课程,占三分之一,并且天天,也没有一点自习时间,每星期三十多点钟,只有午后,才有时间或运动”[38](57页),证实了学生学习任务繁重的事实。总之,20年代后,西部基督师范课程设置呈现出重实用、重效率、更中国化的变迁趋势。

(二)强调教学实践、教育研究与学用结合

从表1至表3的课程设置看,各校均有参观、实习课程,且比重较大。华大教育科学生常能亲自接触四川教育的实际现状,“除实习教育及参观官立学校、教会学校外,尤须于学校管理得有经验(如代理中学校之舍监等事),且参加一暑期学校与师范讲习会也。学生等每在成都各中学担任教科,供给学费。其为主日学校主任者亦复不少。尤有任教会或教育联合会之教育委员者”,所以学生毕业时对教育问题均能洞明原委和确有经验,出而任事,多胜任愉快,能力卓著[2](65页)。华西协合女子师范学校特别重视实习,实习课程第一年为7学时,第二年为8学时,“实习教授,成绩最称佳胜”。附属女子小学,担任教科者皆师范生,各师范生“不特于教授上得实地练习,即于管理上亦饶有经验,每一教科,令一生分任之,其期间自一月至一学期不等”[2](67页),“师范班之学生于此实习学校内,在教员指导之下,每日须实习教授数次”[39](42—44页)。华西协合男子师范学校对实习科更重视,专门设置实习主任。改制后的实习分两步:学生刚入校的前十周内安排参观模范班、试教、讨论三项,为实习做准备;十周以后,开始实习,每周五次,至毕业时,学生必须在附近小学实习。1924年,华西协合师范学校实行辅导实习法,每班由正教生一人担任教课,副教生一人担任辅导学生及批评正教生,正副教生每周互换一次。各组设指导员一人,为大学教育科学员,监视学生实习并品评成绩。实习在每日午后三至四点钟进行,教生每星期报告一次。这种实习法的好处有三点:一是有正当的监察,且管理严密周到;二是专科教员(指担任教授法的教员)随时监察实习,并与指导员讨论注意事项,使实习与教学法课程有密切联络;三是实习地点都是附近小学校,有完全乡间小学性质的,教生得着实

际上的练习,便于将来应付乡村环境[35](1—2页)。据华师实习主任刘之介观察:1924年,华师的实习,“好的固然有,不满意的地方也多”,在指导员、正教生、副教生三方面存在不满意之处[40](21—22页)。

各校还注意鼓励与引导学生在校期间养成自主学习、自由研讨、自主管理的习惯。华大设有教育研究会,全体教育科学生为会员,除开办通常会、彼此研究学理及筹议会议外,1924年,华西教育研究会还敦请教育名士讲演三次,举行参观一次。第一次是请芝加哥大学硕士、时任国立成都高等师范学校教务长王克仁演讲中学课程之编制;第二、三次是请中国教育名士、国立成都高等师范学校教授舒新城演讲中国之中学教育问题;参观地点是成都女高师校和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及其附设中学、小学、幼稚园等,参观内容为经费、校舍、教职员、学生、教材、课程、教授法、管理法、设备、课外作业、卫生等[41](25—26页)。1924年12月6日,华西协合师范学校成立学生自治团体一励志会,全校学生皆为会员,每学期开大会一次,间周六开研究会一次,讨论教育上的重要问题[42](43—44页);1925年秋,又创设讨论会,将请人讲演与自行讨论相间举行,讨论不拘材料与体裁,学生感觉讨论会“较之纯属形而上学之讲演者,更觉有味”[27](41页)。

(三)具有强烈的宗教色彩

毋庸讳言,基督教教育的首要办学目的和宗旨在培养信教的人才,“使基督教精神浸渍于学校生活之中,而供给学者精神上最深切之需要”,实现传教之目的,并创造一种适合基督教的“社会秩序”和“社会制度”[5](42、44页)。基督教师范教育的目的与宗旨更是如此,这从四川基督教师范教育机关的宗教课程设置及校园活动可以得到反映。

华大要求教育科学生三年预科须修读6学分、三年本科须修读4学分宗教课,华大中等师范科、华西男子与女子师范学校均在每周开设2—2.5学时宗教课,暑期师范学校则开设圣经教法课程。各校的校园生活也浸润了浓厚的宗教色彩。如华西协合大学常常举行宗教活动,早期主日崇拜在赫斐院举行,40年代中期费尔朴主持修建一座礼拜堂,作为每周的礼拜地点;校内各基督教徒团契种类繁多,人数不等,这些团契大多从事崇拜、查经、灵修等宗教活动以及文娱活动、乡村服务等社会服务。1933年,在教育部立案后,华大文学院设立公共课教研组一宗教组,负责大一文科学生的基督教知识教育,《为人师的耶稣》一书曾作为学生的必读本

[14](349页)。该校教职员和学生中均有相当数量的基督教徒。据1950年方叔轩填写的该校情况调查表统计,全校教员270人,其中基督教徒109人,学生1131人,基督教徒301人[14](349页)。华西协合女师范学校的宗教色彩更为浓厚,学生须担任相当频繁的宗教传播义务,校内的宗教讲演也十分频繁。1925年,据校长明德馨报告:“每星期日,本校学生各至其本会之礼拜堂礼拜;并讲授主日学课,以表现其服务精神”;“本校之学生被请为其所能为之宗教上的服务,如唱诗或讲道与未曾听见主名之人听”;每月之内,在有学生母亲及亲友参加的附属学校和幼稚园学生恳亲会上,“师范班之学生则为之讲演圣经及卫生事项”;一年之内,“毕云汉牧师每周教授圣经两小时,李德良牧师在耶稣复活节一周内之讲演,及女青年会之刘德丽教士教授‘圣经之如何成就’”,在强烈的宗教熏陶下,“附设学校之第四级学生,今年均愿入教”。华西女师的办学宗旨就是“欲从川省各地招收学子入校,而以基督精神熏陶之,使之具有基督人格,而为巾帼伟人;无论言语行为,均足以表现基督之真意义”,“成为华西基督教之领袖,而使中华归主之大事业易于成功”[35](42—44页)。

通过师范与宗教教育,教会师范毕业生信仰与献身基督的精神以及良好的教师素质和教授技能得以养成,教会学校师资数量与水平有了明显提高。如某县学校视察员盛赞教会师范毕业生“胜于中学毕业生倍蓰”,“提议该县受教会津贴之中学生,均当转入师范学校”[2](71页)。一些教会师范毕业生成为教会私立中小学的骨干教师或校长。据记载:1930年,华大毕业生担任教会私立中学校长者已达15人,华西协合女子师范学校毕业生1人担任中学校长[28](67、76—80页)。

综上所述,系统内部与外部的师资需求压力是导致在华基督师范学校产生和发展的直接原因,培养信教的中国教师以实现“教会学校教育更加有效率,更加基督教化,更加中国化”[43](219页)乃至在中国长久存在下去的目标,则是基督师范教育发展的根本动力。可以说,西部基督师范学校,既是近代四川中西文化交流的产物与媒介,又是欧美在西部中国树立的师范教育样板与参照,还是西方列强在西部地区进行文化渗透和侵略的工具,它的发展过程大致反映了中国师范教育由日本影响向欧美影响转化、再由欧美影响到中国独立自主发展的变迁历程。

注释:

①关于清末教会学校参与中国师资培养的问题研究的成果有史静寰发表的《教会学校与近代中国的师资培养》(《高等师范教育研究》1995年第1期)和陈剑华发表的《清末教会学校师资状况分析》(《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1期)两篇文章以及何晓夏、史静寰著《教会学校与中国教育近代化》(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七章教会学校与近代中国的师资培养。史静寰先生主要以同文馆参与中国近代师资培养的例子,对19世纪末教会学校参与中国近代师资培养问题作了探讨;陈剑华先生主要就清末教会学校的师资来源与培养情况作了研究。关于民国时期教会大学参与中国师资培养的问题,(美)杰西·格·卢茨著《中国教会大学史1850—1950》、王立诚《美国文化渗透与近代中国教育——沪江大学的历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以及《华西医科大学校史1910—1985》(成都:四川教育出版1990年版)等有所涉及。

②涉及近现代四川教会教育的论著,主要有魏瀛涛主编《四川近代史稿》(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二章第二节、刘吉西等编《四川基督教》第五章、熊明安等主编《四川教育史稿》第五章第三节以及《四川省志·教育志》(北京:方志出版社2000年版)第三、四、五篇等,但各书都未讨论四川基督教师范教育问题。

参考文献:

- [1]学部咨各省外人在内地设学无庸立案学生概不给奖文[A].大清教育新法令:第2册[M].第3版.上海:商务印书馆编印,1911.
- [2]华雷士(E. W. Wallace).中国西部之师范教育[J].坚瓠译.教育杂志,1919,11(8).
- [3]基督教教育之目的与精神[A].中国基督教教育事业[M].上海:商务印书馆,1922.
- [4]转引自:陈剑华.清末教会学校师资状况分析[J].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96,(1).
- [5]李楚材.帝国主义侵华教育史资料——教会教育[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7.
- [6]基督教教育一览表[J].中华教育界,1925,14(8).
- [7]教育部.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M].上海:开明书店,1934.
- [8]杨效春.收回教会师范学校问题[J].中华教育界,1925,14(8).
- [9]程天放.确定教育目标与改革教育制度案原文[A].抗战前教育政策与改革[M].黄季陆.革命文献:第54辑[Z].台湾:中央文物供应社,1971.
- [10]教育部.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M].上海:商务印书馆,1948.
- [11]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全国高等教育概况(1939年3月)[A].抗战前之高等教育[M].黄季陆.革命文献:第56辑[Z].台湾:中央文物供应社,1971.
- [12]周洪宇,马敏.中西文化交流与教会大学——首届中国教会大学史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A].章开沅,林蔚.中西文化与教会大学——首届中国教会大学史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1.
- [13]古洛东.圣教入川记[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
- [14]刘吉西,等.四川基督教[M].成都:巴蜀书社,1992.
- [15]基督教势力范围中之教会学校及学生统计表(1921年)[A].陈学恂.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下册[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
- [16]饶和美.1924年华西教育会总干事致教育董事部的报告[J].华西教育季刊,1924,2(4).
- [17]中国信道教员[A].诚静怡.中华基督教会年鉴:第6期[M].上海:中华续行委办会,1921.
- [18]四川贵州云南三省直教概况[A].中国信道教员[A].中华基督教会年鉴:第7期[M].上海: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1924.
- [19]方叔轩.基督教教育在中国有恒久位置没有?[J].华西教育季报,1924,2(1).
- [20]华西教育会第十七次年会记录[J].华西教育季刊,1924,2(1).
- [21]田云樵.川北教育会议[J].华西教育季刊,1924,2(4).
- [22]华西教育会教育部第十八次年会报告[J].华西教育季报,1924,2(4).
- [23]华西教育会教育董事部第十九次年会议决案[J].华西教育季报,1925,3(4).
- [24]毕启.1924年华西协合大学校上华西教育会董事部的报告[J].华西教育季报,1925,3(1).
- [25]理事部会议[J].华西协合大学校刊,1927,1(1).
- [26]成都华西协合师范学校通告[J].华西教育季报,1925,3(2).
- [27]华西师范近况杂记[J].华西教育季刊,1926,4(1).
- [28]教育部普通教育司.民国十九年度全国公私立中等学校名称及分布概况[M].南京:京华印书馆,1933.
- [29]四川省会公私立未立案各级学校调查概况表[M].四川省第八区省督学黄德毅调查,1932-11.
- [30]民国二十五年全国中等学校一览表[M].教育部统计室编印,1936.
- [31]四川省政府教育厅二十八年年报[J].四川省教育厅教育丛刊,第9辑厅字第3号.1940-03.
- [32]全国师范学校一览表·四川省[M].教育部中等教育司编印,1942.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案卷号5-9196.
- [33]成都华西协合大学夏令学校招生广告[J].华西教育季刊,1924,2(1)&1925,3(1).
- [34]饶和美.1924年华西大学教育科上华西教育会董事部的报告[J].华西教育季报,1925,3(1).
- [35]弁言[J].华西教育季刊,1925,3(2).
- [36]教职员姓名籍贯职务一览表[J].华西教育季报,1925,3(2).
- [37]成都华西协和师范学校通告[J].华西教育季刊,1925,3(2).
- [38]蒋富祥.我在华师一年的生活[J].华西教育季报,1925,3(2).
- [39]明德馨.1924年华西协合女师范学校上华西教育会董事部的报告[J].华西教育季报,1925,3(1).
- [40]刘之介.一年来华师之实习[J].华西教育季刊,1925,3(2).
- [41]胡萝卜.华西大学教育研究会之近况[J].华西教育季刊,1924,2(4).

[42] 萧崇礼. 华西协合师范学校励志会的报告[J]. 华西教育季报, 1925, 3(2).

[43] 转引自: (美) 杰西·格·卢茨. 中国教会大学史 1850—1950[M]. 曾钜生译. 杭州: 浙江教育出版社, 1988.

Christian Normal Education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LING Xing-zhen

(Editorial Office of the Journal of SNU, 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0068, China)

Abstract: The immediate cause for the emergence and development of Christian normal education in China is the demand for teachers inside and outside churches between the end of the Qing Dynasty and the beginning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its fundamental driving force is the realization of “missionary school being more effective, of more Christian nature and of more Chinese nature” and even the goal of forever existence in China by training the Christian Chinese teachers, and its common features are attention to educational theory and methodology, emphasis on teaching practice, educational research and a combination of learning and use, and importance attached to Chinese learning, western learning and religious education.

Key words: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Christianity; normal education; Sichuan; West China Education Association

[责任编辑: 李大明]

● 书讯

房锐主编《晚唐五代巴蜀文学论稿》出版

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房锐博士主编, 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汤瑛、赵晓兰、张海、房锐、王红霞、田道英等撰写的《晚唐五代巴蜀文学论稿》目前已由巴蜀书社出版发行。

《晚唐五代巴蜀文学论稿》是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五”规划 2003 年度项目的结题成果, 由 24 篇论文组成。部分论文作为课题的阶段性成果, 曾在《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社会科学家》、《社会科学研究》、《求索》等刊物上发表, 《张嶷考略》一文被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2004 年第 8 期全文转载。

《晚唐五代巴蜀文学论稿》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大胆地进行了学术创新, 不少论题极具前瞻性, 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一些论文选取晚唐五代巴蜀文学研究中不大引人注意的作家、作品, 进行“一网打尽”式的系统考察研究, 从中挖掘出不少有价值的东西, 并纠正了若干文献错误, 为晚唐五代巴蜀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线索、新的思路, 突出了巴蜀文学的独特风貌及难以替代的价值。如《雍陶寓居云南说辨析》、《张嶷考略》、《贯休蜀中诗歌编年考证》、《孙光宪江南、湖湘之行考述》、《前后蜀著作考略》等论文, 便是这方面的力作。

《晚唐五代巴蜀文学论稿》不乏闪光点。如《敦煌曲子词与〈花间集〉》、《论〈花间集〉在词史上的意义》、《论花间词的传播及南唐词对花间词的接受》、《前后蜀讽谕诗初探》等论文征引文献丰富、角度新颖, 立论巧妙, 所得出的结论多与历史事实与文学创作的实际情况相符合。这些论文有助于较为准确地把握晚唐五代巴蜀文学发展演变的规律, 对于其他地域文化的研究, 也具有较大的启迪作用。

作为目前国内外第一部对晚唐五代巴蜀文学进行专题研究的论集, 本书创获颇多, 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本书自出版以来, 已获得海内外专家学者的好评。(魏 仁)